

# 东亚模式与莱茵模式的部分结合： 希腊宏观经济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忻 华<sup>1</sup>

(1. 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摘要:** 希腊在冷战时代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经济出现了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路径依赖”, 但因其人口结构所限, 而无法走上出口导向型的道路。此后, 希腊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借助欧盟的内部整合政策和内部援助体制, 实现了高负债与高赤字背景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结果使高负债和高赤字长期延续而形成惯性。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希腊宏观经济可视为半个“东亚模式”与半个“莱茵模式”的结合体。

**关键词:** 希腊宏观经济; 东亚模式; 莱茵模式; 欧洲一体化进程;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F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0)11-0060-11

## 一、引言: 希腊经济的总体特征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撼动了欧元区金融体系的根基。不少学者从欧盟金融制度的层面分析其原因, 认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与多元财政政策并存, 是危机形成的主要诱因。目前所见的文献, 对引发债务危机的希腊国内根源, 特别是与危机相关的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则往往语焉不详。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 阐释危机背后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 论述其形成机制, 包括路径选择与演化历程, 并解释希腊国内社会与政治结构及其外部的国际制度架构在其形成机制中所

发挥的作用。

早在 1960 年代, 就有学者指出, 希腊的资本供给成本高、风险高、回报低, 致使资本供给越来越稀缺, 这又导致以证券体系为代表的国内资本市场发育缓慢, 形成恶性循环。<sup>①</sup> 后来又有人提出, 希腊针对进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分别为 -1.295 和 -1.035, 说明即使希腊国内的收入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同步, 其出口仍不足以抵消进口而产生顺差, 因而其国际收支将长期处于赤字; 且希腊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分别为 -0.340 和 -0.458, 表明其纯依靠本币贬值并不能显著改善其国际收支状

收稿日期: 2010-10-09 修订日期: 2010-11-03

作者简介: 忻华 (1976-), 男, 浙江宁波人, 上海欧洲学会首席译员兼特邀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心讲师, 国际关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互动关系。

<sup>①</sup> D im ed es P s i lo s *The Capital M arket of Greece: A Study of Finance in Econom 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Unpub lished Ph. D. D 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63.

况。<sup>①</sup> 还有学者认为, 希腊民营企业普遍规模小、利润率低、竞争力弱、国际化水平差, 而希腊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控制过多, 导致国有企业和政府雇员队伍不断膨胀, 鼓励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微观制度资源却依旧奇缺, 其经济缺乏活力。<sup>②</sup>

这些分析相当精准, 但都相当零碎。总体观之, 希腊宏观经济可概括为“半个东亚模式与半个莱茵模式的结合”。所谓半个“东亚模式”, 是指希腊政府长期强势干预经济, 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一特点与“东亚模式”诸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颇为类似。然而, 东亚各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依靠本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形成的比较优势, 并凭借低估的汇率, 从国际市场获取大量贸易顺差, 形成所谓“国家重商主义 (State Mercantilism)”; 且“东亚模式”各国长期维持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相比之下, 希腊宏观经济的运作并不具备这些特征。所谓半个“莱茵模式”, 是指希腊经济的高福利特征, 其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公共财政开支的比例相当高, 且其国内工会势力强大, 社会保障体系较发达, 但失业率较高。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各国在拥有高福利特征的同时实施高税收政策, 拥有高效的税收运作体系, 希腊则并非如此。因而希腊宏观经济可以说是兼具“东亚模式”和“莱茵模式”的部分特点, 自成体系。

## 二、希腊宏观经济的四项结构特征

具体言之, 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 2.1 强势政府背景下的高负债与高赤字

希腊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在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背景下, 公共财政和对外经济长期维持高负债与高赤字。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使政府债务持续膨胀, 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导致其外债总额、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长。

2008年秋冰岛的债务危机震惊世界。与冰岛相比, 希腊外债似乎并不严重, 其外债总额占其 GDP 总量之比重远低于冰岛。至 2009 年底, 冰岛外债总额相当于其 GDP 的 908.4%, 而希腊外债总额仅相当于其 GDP 的 189.49%, 且希腊并未走到宣布无力偿还外债这一步。然而, 分析两国的外债结构, 就可以发现显著不同。冰岛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程度较高, 其外债主要归属于冰岛的商业银行及其他民间商业机构, 而非政府。在冰岛金融危机爆发的 08 年 3 季度末, 冰岛政府持有的外债额仅占其外债总额的 4.7%, 至 2009 年底, 其政府持有之外债亦只占其外债总额的 4.4%。而希腊经济长期以来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 外债主要归属于希腊政府。至 2009 年底, 希腊政府 (包括其央行) 持有的外债占其外债总额的 79.9%。这就意味着尽管就绝对值和占 GDP 的比例而言, 希腊外债的恶化程度低于冰岛, 但希腊外债对其社会生活、政治结构、乃至地区与国际政治结构的冲击, 要远比冰岛强烈。

与欧元区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各国相比, 希腊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希腊的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例不仅远高于欧元区和 OECD 的平均水平, 而且也高于冰岛, 在所谓“欧猪五国 (SPIIG)”<sup>③</sup>中, 仅略低于意大利 (见图 1)。而希腊财政赤字占其 GDP 之比例也高于欧元区和 OECD 的平均水平 (见图 2)。1995 年至 2007 年, 希腊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年均 107.63%, 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为年均 75.8%, OECD 的平均水平为年均 72.3%。同时自 1997 年以来, 希腊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始终为赤字, 其赤字额平均每年为其 GDP 的 7.8%, 在 OECD 国家中仅次于冰岛和爱沙尼亚, 排在第三位。

<sup>①</sup> Eleftherios Ioannis Thakassinou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ase of Greec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1983.

<sup>②</sup> Nicholas G. Piromakis *The Greek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sup>③</sup> “欧猪五国”成员国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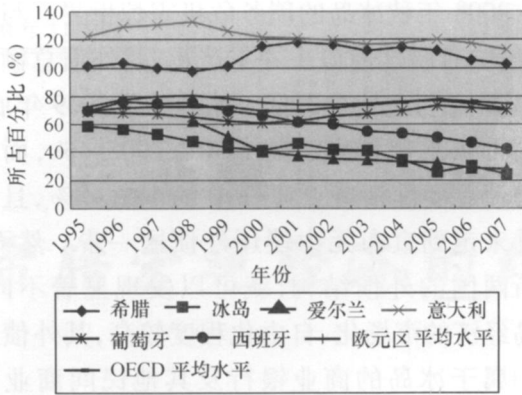


图 1 欧洲外围部分国家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之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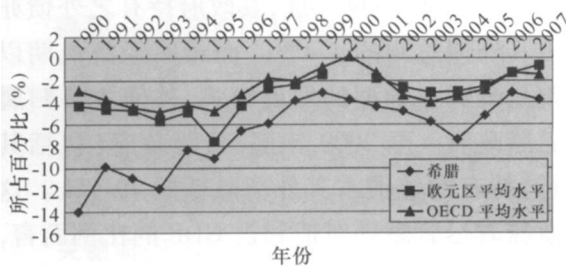


图 2 希腊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的国际比较 1990—2007 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央行及欧盟委员会下属统计局 Eurostat 的数据整理绘制)

## 2.2 高消费、高福利、低投资、低储蓄、低税收

第二项结构特征,是希腊整个经济体系的高消费、高福利、低投资、低储蓄、低税收。就希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而言,其消费率较高,投资率较低,而储蓄率更低,其净储蓄为负,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在欧盟经济体系中排前列。就其公共财政而

言,社会福利支出占据了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份额,而政府主导的投资则只占较小份额。政府既未积极投资大型项目以拉动 GDP 增长,亦未有效刺激民间私人投资,结果造成希腊宏观经济的投资需求极弱,投资率较低。这与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政府主导投资的“东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希腊主要通过大量增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其政府负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务人员报酬等方面。自 1998 年以来,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务人员报酬始终占希腊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50% 以上(见图 4)。自 2000 年以来,希腊政府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其财政总支出之比例始终少于 6.7%,总体投资率始终低于 23.5%。而作为“东亚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政府在 1994 年至 2007 年之间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年均 24.9%,其总投资率则为年均 25.4% (见图 3)。同时,与欧盟及 OECD 平均水平相比,希腊经济体系中的税收水平较低,不仅税率低,而且税基小(见表 1)。这一特点在欧盟各国中可谓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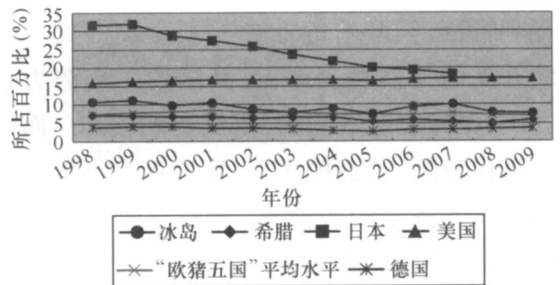


图 3 希腊与部分国家政府支出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其财政总支出之比例 1998—2009 年

表 1 希腊与欧盟 15 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水平(税收占工资总额之比重)比较

家庭类型	单身 无子女	单身 有子女	单身 有 2 个子女	单身有 2 个子女	单身有 2 个子女	已婚有 2 个子女	已婚有 2 个子女	已婚 无子女
工资水平 (占全国平均工资)(%)	67	100	167	67	100	133	167	133
希腊税收水平(%)	1.2	8.7	17.3	0.4	9.1	7.1	6.3	7.8
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	12.3	17.6	25.6	7.4	11.5	11.9	13.9	13.5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委员会下属统计局 Eurosta 的数据绘制)

## 2.3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

第三项特征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

势头在不断发展,但其国民经济总体结构没有改变,且希腊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业为主流,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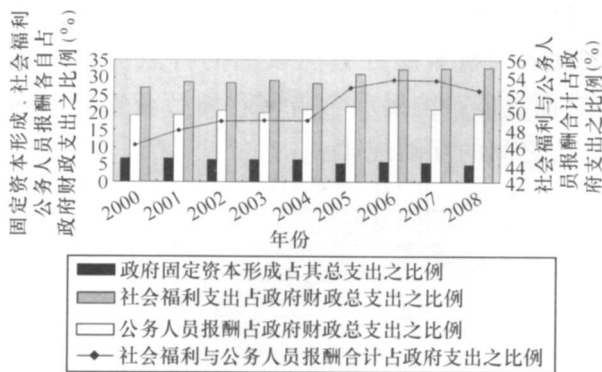


图 4 希腊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2000—2009 年

(资料来源: 根据希腊、日本、美国的央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以及 OECD 和欧盟委员会下属统计局 Eurostat 的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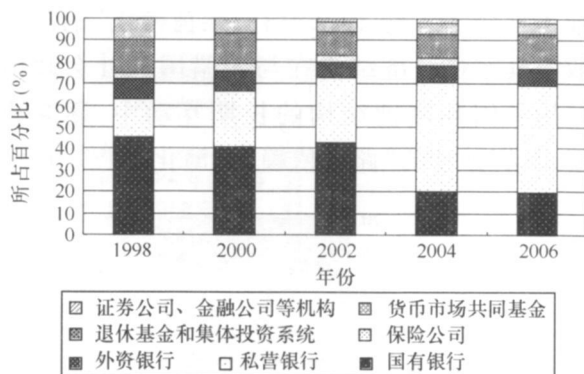


图 5 希腊金融体系结构 1998—2006 年

(资料来源: 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和 OECD 提供的数据绘制)

银行仍占据金融体系重要位置。与冰岛一样, 希腊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 政府放松银根, 实施非常宽松的信贷政策, 促使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 其年均增长速度为 2.8%, 高于 OECD 平均水平 (2.47%), 亦高于法国 (1.80%)、德国 (1.36%)、美国 (0.35%) 的速度。至 2009 年底, 希腊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总增加值占 GDP 总额的 17%。同时, 自 1999 年以后, 追随美国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热潮, 希腊银行的利率不断下降, 特别是房屋按揭贷款的利率不断下降, 银行体系流动性不断增强, 其商业银行平均的贷款存款率从 1999 年的 52.4% 上升到 2004 年的 86.2%。这为 2010 年初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但在同时, 希腊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业为主, 其证券业与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居于次要地位, 雅典证券市场为融资提供的金融产品非常有限且交易并不活跃。在银行业体系中, 2004 年以前政府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国有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整个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一半左右。2004 年至 2009 年, 中右翼的希腊新民主党上台执政后, 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 私营银行开始在希腊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但国有银行仍占整个希腊金融体系 22% 的份额 (见图 5)。

#### 2.4 高失业率与人口老龄化相伴

希腊宏观经济的第四项结构特征是: 劳动力市场长期低迷, 失业率、特别是长期失业率居

高不下, 且与不断加重的人口老龄化相伴。这不仅使希腊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 而且表明希腊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缺陷长期没有明显改善, 其产业结构升级较慢。希腊面积虽小, 人口亦不多, 人口密度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但其失业率却在欧洲位居前列。根据欧盟委员会 2010 年 1 月的估算, 希腊总人口为 1130.6 万, 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83 人, 不仅低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 在“欧猪五国”中亦仅高于爱尔兰, 在全欧洲 56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38 位。自 1998 年 1 季度至 2009 年 4 季度, 希腊总体失业率每季度平均为 10.01%, 最低不会低于 7.2%, 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为年均 53.4%。其 2008 年的失业率位居全欧洲第 15 位 (见图 6)。与高失业率相伴而生的是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占其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早在 1952 年就超过 7%, 越过了世界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门槛; 在 1969 年以后超过 10%; 在 1994 年以后, 这一比例就超过了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欧猪五国”平均水平和英法德三国的平均水平。

### 三、希腊宏观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

希腊宏观经济自成体系, 结构独特, 一方面像“东亚模式”那样, 由政府强势干预经济, 却没有“东亚模式”的强烈重商主义情结; 另一方面像“莱茵模式”那样, 福利水平高, 以银行

业主导金融体系,但却没有“莱茵模式”的高税收。其宏观经济结构在与希腊国内社会政治结构和国际制度结构的长期互动中,逐渐成形,具有独特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进程。仔细

分析其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希腊社会与政治的特点与演变规律,而且能系统揭示希腊与欧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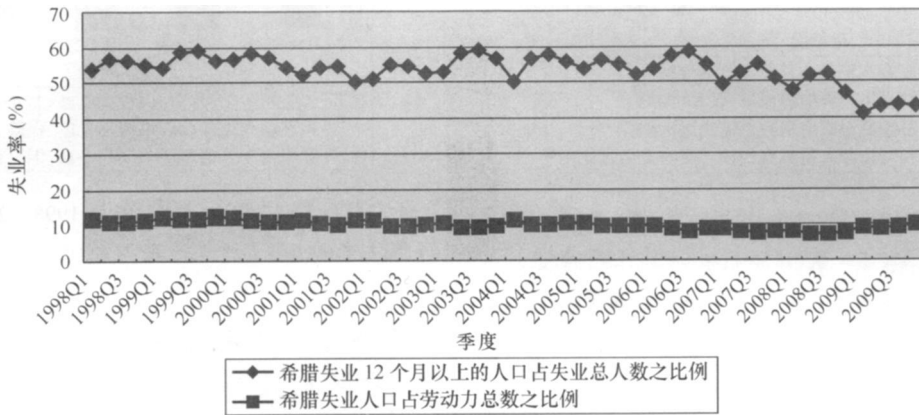


图 6 希腊总体失业率为长期失业率的 1998-2009 年

(资料来源:希腊国家统计局)

### 3.1 从“路径依赖”理论解析希腊经济的长期演化模式

在解释各国经济的演化历程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时,“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y Theory)是强有力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任何一国的经济演化都会在内外多种结构性因素和偶然扰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进入特定的轨道,即所谓“路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含有偶然或随机的成分,但一旦经济演化与其外部结构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即所谓“锁定”(Lock-up),就会进入不可逆、乃至不可偏转的加速运动。这种“路径依赖”往往与“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结合在一起,使各国经济发展自成体系。两国经济即使归属同种类型的模式,如“东亚模式”中的日本与韩国,“莱茵模式”中的德国与法国,也会各具特色,不尽相同。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的阿瑟(Brian Arthur)和坎贝欧(John L. Campbell)将“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概括为“互动”——“解读”——“对现有要素之利用”三步,其核心思想就是,演化主体在与其内外环境的频繁互动中,解读环境的性质,界定所面对的问题,并试图利用环境提供的要素解决问题。在自身观念和环境要素的同时作用下,

演化主体经由“自增强机制”进入“锁定”状态,从而形成“路径依赖”<sup>①</sup>(见图 7)。

“路径依赖”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型,可以为我们解读希腊宏观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提供指导性思路。目前希腊的宏观经济结构,是其在二战后半多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内外环境的制度框架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1960年代希腊军人独裁政权形成的强势政府的传统治理结构,国内不断强化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相关政治力量,成为制约其宏观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的基础结构,这是塑造其“路径依赖”的内部环境;而同时在国际社会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同盟体系和金融与贸易体系,以及欧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影响着希腊国内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演化,制约了宏观经济演化的基本方向与发展速度,这是塑造其“路径依赖”的外部环境。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希腊宏观经济成为一半“东亚模

<sup>①</sup> John L. Campbell “Mechanism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in Economic Governance: Inte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Bricolage”, in Lars Magnusson and Jan Ottosson eds., *Evolu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Ideas Past and Present*, Northampton of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01, pp. 10-13.

式”与一半“莱茵模式”相结合的混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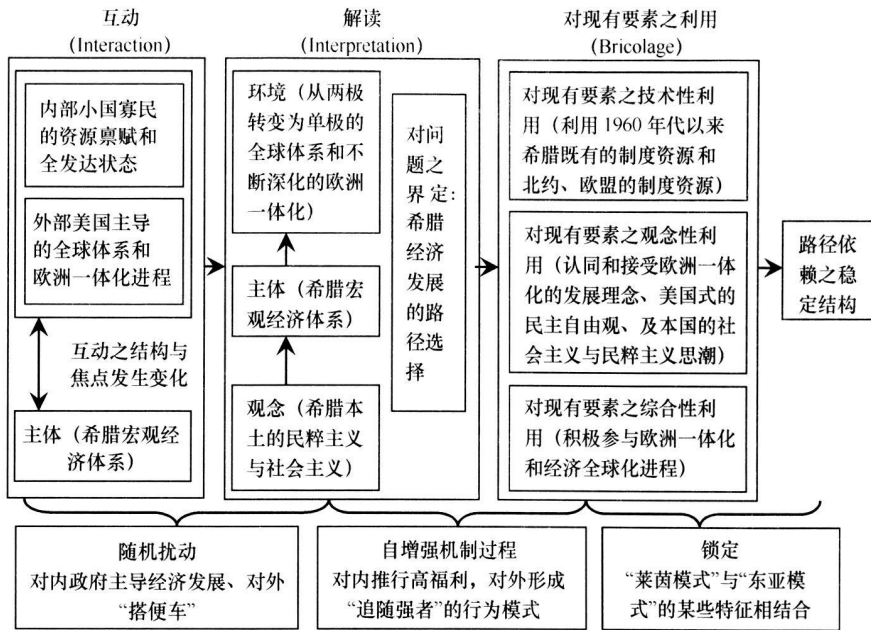


图 7 希腊经济结构的演化形成“路径依赖”的模型

### 3.2 塑造希腊宏观经济结构特征的内部社会政治环境

就内部环境而言, 希腊二战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制度背景作为关键性结构因素, 制约和塑造着希腊宏观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演进方向。这表现在两方面。

#### (1) 威权体制形成的强势政府的传统

首先, 二战后希腊军人集团建立独裁统治, 是其经济走向政府主导型结构的主要原因。二战结束时, 希腊极度贫困, 矛盾丛生, 致使政治动荡。1950年至 1967年, 希腊政府一共更迭了 23次, 其中 1950年代政府更迭了 10次, 平均每年更迭一次。在此背景下, 唯有强势政府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秩序。在保守势力的推动下, 1967年至 1974年, 以潘帕多普罗斯 (Georgios Papadopoulos) 为首的极右翼军人集团在希腊实施独裁统治, 对左翼势力保持高压, 取消民主制度, 推行反共意识形态。希腊的军人政权得到美国的认可与支持, 接受美国的援助, 在美国的指导下发展外向型经济, 其政治结构、对外关系、经济治理模式, 与当时东亚的韩国与台湾非常类似。政府主导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 在这

一时期的希腊宏观经济中逐渐确立。军人独裁政权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治理模式, 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实施高负债、高赤字、高投资和本币贬值, 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1967至 1973年希腊 GDP增长率为年均 8.6%, 工业生产年均增长 10% 以上, 形成了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的飞速发展非常类似的“希腊奇迹”。

然而, 虽然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行为模式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 希腊却未能走上出口导向型的轨道,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并未成为增长的源泉。造船业、旅游业、船运业为希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其 GDP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可谓独具特色。其原因, 在于希腊的人口结构。希腊不具备“东亚四小龙”那样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如前所述, 早在 1952年就已达到老龄化标准。1960年代末, 希腊军人政权曾实施限制希腊人向外移民的政策, 以防止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此后虽因希腊与土耳其的军事争端不断有移民进入, 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仍有增无减 (见图 8)。这使希腊走上了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发展路径。不过, 与一国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的行为模式一旦确立, 就会形成

“自增强机制”，不断自我强化和维持，进入“锁定”状态，形成“路径依赖”。尽管 1974 年军人政权解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反复博弈，但由于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治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够

为经济发展带来迅速的效果，既而为社会所接受，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希腊宏观经济的重要结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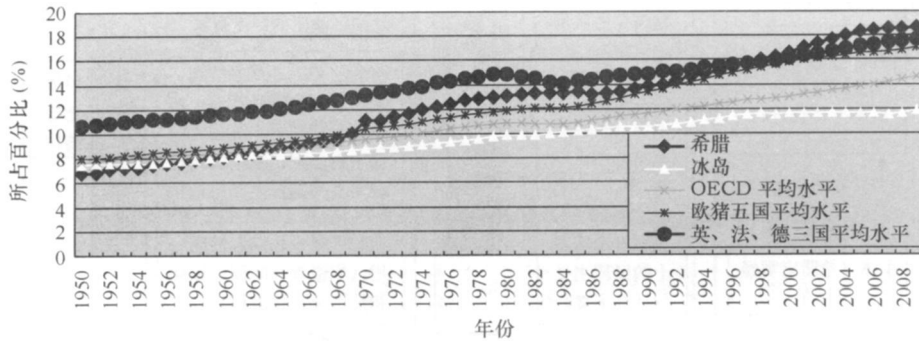


图 8 希腊与部分国家 65 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力总数之比例 1950—2009 年

(资料来源: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和 OECD 的数据绘制)

## (2) 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

1974 年军人政权解体后，民主制度在希腊恢复，多党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确立，政局从此趋于稳定。希腊宏观经济的另一结构特征，即高福利、低税收，则从此逐步确立下来。这一特征的形成，根源在于希腊社会根基深厚、影响广泛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希腊的壮大，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希腊社会并不存在本土的贵族或精英阶层，精英政治在希腊并无传统，这为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育壮大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巨大的空间。一个很有趣的例证就是，作为传统民主国家，英国直到 1918 年才立法确认 21 岁以上男性公民的普选权，而希腊在 1864 年就已确立这一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希腊在 1970 年代以前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社会大众普遍贫困，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动员力。希腊经济学家皮侬耐克思 (Nicholas G. Pirounakis) 曾谈到：“倘若超级大国在二战后能够允许欧洲各国按照自己的民意自行发展，则希腊必定会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sup>①</sup>

在希腊的议会党团中，左翼阵营占据优

势。目前有 5 个政党在希腊议会占有议席：希腊共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激进左翼同盟、希腊新民主党、人民东正教大会。前三个均属左翼阵营，共占有议会 300 个席位中的 194 个，达到总数的 64.7%，其意识形态涵盖从温和到激进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而占议会 15 席的右翼政党“人民东正教大会”，则公开宣称以“右翼民粹主义”为自己的立党意识形态。同时，民主制的恢复也使工会组织不断壮大。目前，希腊三大工会 (GSEE, ADEDY, PAME) 拥有 114.5 万会员，占希腊劳动力总数的 26%，其组织机构遍及全国。2010 年年初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国内全国规模的罢工已超过 5 次，并不断引发暴力流血冲突，造成至少 3 人死亡。可见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足以影响希腊政局。

因此，任何领导人上台，都绝不能忽视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希腊民众中的广泛影响，不敢随意削减福利。于是高消费、高福利、低税收的实践逐渐从刺激经济的临时性政策，转变为希腊宏观经济中持久的结构特征。

<sup>①</sup> Nicholas G. Pirounakis *The Greek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17.



### 3.3 塑造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外部国际制度架构

就其外部环境而言, 美国主导的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和地区层面的欧洲一体化机制, 是塑造和制约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主要制度框架。希腊作为欧洲地理边缘的小国, 和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中的“半外围地区”, 通过“搭便车”(Free Ride)和“追随强者”(Band Wagon Effect)的方式, 使自身宏观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并逐步演化出前述结构特征。

所谓“搭便车”, 即指小国通过融入大国主导的国际制度结构, 免费或廉价获取大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包括对自身安全的战略保障, 稳定有序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制度环境等。在“搭便车”的过程中, 小国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大国的意识形态, 认同大国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架构, 出现“追随强者”的心理定势, 形成模仿大国既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但是, 正如基因的复制总会出现变异那样, 小国在“追随强者”时, 绝不会毫厘不差地复制大国既有的制度架构与运作方式, 其在形成“路径依赖”的演化进程中, 必会演化出自身独特的制度结构。希腊宏观经济的演化正是如此。

#### (1) 全球层面的制度架构

首先来看全球层面。美国在冷战初期构建的全球战略安全同盟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 决定了战后希腊宏观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的基本方向, 使希腊宏观经济走上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道路, 同时也影响着希腊宏观经济演化的进度。

冷战初期, 正值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发展模式和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 在落后国家中颇受推崇, 对希腊影响深刻。内战结束后的希腊政府宣布希腊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但同时却参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编订和实施五年经济发展规划。

然而, 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 因希腊的

地缘战略位置与历史文化传统原因, 使其最终选择倒向西方阵营, 而非苏联阵营。在政治上, 希腊 1952 年参加北约, 1953 年与美国缔结共同防御协定, 1973 年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在经济上, 1948 年参加马歇尔计划, 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MF) 和关贸总协定, 1960 年参加 OECD, 一步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层面的制度架构。

希腊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其得以稳定地获取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包括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 以及平稳有序的金融与贸易秩序。前者使希腊得以减轻国防开支的负担, 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后者则相当关键, 使希腊经济逐渐形成市场化和外向型轨迹的“路径依赖”。离开了外向型和市场化的路径, 旅游业和船运业不可能成为希腊经济的核心部门和增长动力, 且 1950 年至 1973 年之间的“希腊奇迹”也就难以出现。因而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在希腊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中, 是至关重要的外部制度框架。

同时, 希腊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 使希腊宏观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 成为全球分工与交换体系的一部分。希腊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变化节奏, 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起伏趋于一致; 希腊宏观经济对外向型、全球化、市场化的“路径依赖”, 使其脆弱性大大增强。纵观希腊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 1950 年至 1973 年为高速增长时期, 其年均 GDP 增长率为 7%, 与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致。而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能源危机的爆发, 使希腊与美国同时陷入“滞涨”之中。美国的“滞涨”所表现出的高通胀率、低增长率、高失业率特征, 在希腊同时期的宏观经济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而持久 (见图 9)。

#### (2) 地区层面的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架构

再来看地区层面。自 1981 年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后, 希腊通过欧洲一体化机制获得两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首先是借助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有效地应对了冷战后周边激烈的民族



与宗教冲突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获得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 减轻了自身在安全事务上的压力。其次是利用欧盟的内部整合机制与内部援助体制,

也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机制, 源源不断地获取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和金融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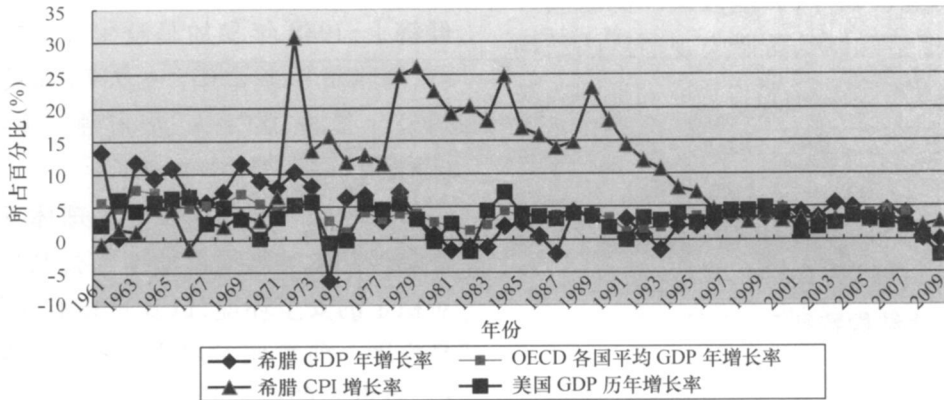


图 9 希腊 GDP 增长率、CPI 增长率、及其国际比较 1961—2009 年  
(资料来源: 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 OECD 的数据绘制)

欧共体和 1992 年以后的欧盟都致力于对欧洲内部各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进行整合 (Cohesion and Harmonization), 实现欧洲内部各国制度结构的彼此协调, 促使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化的速度与节奏趋于一致。希腊作为欧洲外围的小国, 不仅人口少, 经济规模小, 而且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其人均 GDP 水平至今在欧盟初始 15 国中仅高于葡萄牙, 且其社会与政治结构脱胎于威权主义体制, 相对于

西欧发达的民主体制和成熟的公民社会而言, 亦显落后。因而希腊 1981 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 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后来的欧盟的社会整合政策 (Cohesion Policy) 的重点援助对象之一。从 1986 年到 2006 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一共对希腊实施了总共四期总体援助计划, 援助总金额达 499.516 亿欧元。欧盟对希腊的最近一期援助计划从 2007 年开始实施, 将于 2013 年结束 (见表 2)。

表 2 欧盟对希腊的援助的基本制度架构 (1986—2013 年)

时段	运作制度框架	援助制度框架	援助项目分类
1986—1989	地中海一体化项目框架		地中海一体化项目
1989—2006	共同体支持框架第 1、2、3 期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农业指导与保障基金项目总计 55.733 亿欧元
		共同渔业政策	渔业指导金融工具项目
		欧盟结构基金	欧洲地区发展基金项目总计 286.1 亿欧元 欧洲社会基金项目总计 90.382 亿欧元
2007—2013	希腊全国战略指导框架	欧盟整合基金	欧盟整合基金项目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农业保障基金项目 欧洲乡村发展项目
		共同渔业政策	欧洲渔业基金项目
		欧盟结构基金	欧洲地区发展基金项目总计将达 123 亿欧元 欧洲社会基金项目总计将达 44 亿欧元
		欧盟整合基金	欧盟整合基金项目

(资料来源: 根据希腊经济发展部及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整理编制)

欧盟对希腊的长期制度性援助, 成为推动希腊经济增长重要的外部资本源泉, 缓解了希腊公共财政的压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希腊经济决策者, 乃至整个希腊宏观经济体系对外部资本来源的依赖。希腊净储蓄率长期为负, 公共财政长期维持高赤字、高负债, 但由于搭上欧洲经济一体化机制、特别是欧元区的便车, 并从欧盟持续获取大量资本, 仍能维持相对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2002年至2009年, 希腊的 GDP 增长率仍然维持在年均 6.4% 的高位, 远高于欧盟 27 国的平均水平 1.23% 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 0.89%。在这种一体化机制的保障下, 赤字和负债的不断膨胀, 并不影响希腊的经济增长速度, 不影响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 希腊宏观决策层并未因赤字和负债而感受到多少压力, 也就不会产生足够的动力改变现状, 于是高赤

字、高负债、低储蓄成为希腊宏观经济持久的结构特征。而自 2010 年初债务危机爆发后, 欧盟提供的救援机制则成为希腊赖以获取救援、渡过难关的最主要的制度资源 (见表 3)。

当然, 随着 G-20 ASEM 等机制的出现, 在上述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制度架构之外, 地区间合作机制作为第三种维度的制度架构, 也开始影响希腊。自 2010 年年初以来, 希腊亦积极寻求亚洲国家的救援和支持。2010 年 7 月 22 日欧盟贸易专员卡瑞·德古特 (Karel De Gucht) 透露, 中国政府已买入数亿欧元的希腊国债, 且自 2009 年年底至今, 中国企业已对希腊投资数十亿欧元, 涉及港口、酒店、电信等行业。这表明在危机的刺激下, 希腊正尝试通过欧亚地区间合作的制度架构获取更多的资源。

表 3 2010 年至今向希腊债务危机提供救援的主要制度架构与资源

救援机制名称	机制运作主体	能够提供的最高援助额度 (亿欧元)	援助形式	融资形式	占援助总额度之比例 (%)
欧洲金融稳定架构	欧元区 16 国、 欧盟委员会、 欧洲中央银行	4 400	贷款	EFSF 发行债券及其他形式的 证券, 由欧元区 16 国提供担 保	58.7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欧盟委员会	600	贷款	欧盟委员会出面以欧盟名义 向资本市场及金融机构融资	8
MF 紧急援助机制	MF	2 500	贷款	MF 提供	33.3

(资料来源: 根据 EFSF 官网、MF 网站、及欧盟网站的信息整理)

#### 四、结语: 半个“东亚模式”与半个 “莱茵模式”的结合

在欧盟有关对希腊的援助文件中, 以及不少学者的著述中, 都将希腊称为“欧洲外围”的国家。其实, 考虑到欧盟东扩的趋势, 以及希腊的人均财富占有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排名, 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 都可以将希腊视作一个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半外围”国家。在欧洲, 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 及其在欧盟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位置, 介于英、法、德三大国形成的“中心”与前苏联阵营的中东欧

国家构成的“外围”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希腊也同样介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国家构成的“中心”与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区之间。按照 MF 在 2009 年使用购买力评价法所作的统计, 希腊的人均 GDP 为 29 882 美元, 排在全世界的第 25 位, 次于日本、台湾, 而高于韩国, 实际上与“东亚模式”的平均水平接近。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中, “半外围”的一些小型经济体, 因处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冲, 得以进入国际政治体系的霸权国主导的战略安全同盟体系中, 搭上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制度架构的“便车”, 追随霸权国的经济与社会

治理模式。然而,“搭便车”的国家和地区因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绝不会简单复制霸权国既有的发展经历,而是往往形成独特的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进而言之,外生的国际制度架构和既有发展模式,与内生的本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决定着—国经济演化的路径选择与“路径依赖”,构建起—国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日本、韩国、台湾搭上美国主导的体系的便车后,所演化出的“东亚模式”就是很好的例证。

希腊经济的演化路径与历程则更复杂一些。就外部环境而言,希腊同时搭上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和欧洲一体化机制两方面的“便车”。在美国的影响下,希腊经济选择了外向型、市场化、全球化的路径;同时因其自身的经

验与传统的制约,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作方式;但因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其外向型的路径选择并未演化到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型的轨道上。在欧盟内部援助机制的影响下,希腊得以在其公共财政与对外经济背负沉重债务的同时,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其高负债、高赤字形成惯性;而同时希腊国内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要比“东亚模式”的经济体更为强大,因而希腊公共财政的高福利和高支出,与高负债和高赤字的实践交互强化,亦成为其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这样,希腊的宏观经济结构,就成为半个“东亚模式”和“半个莱茵”模式的结合,而自成体系,独具特色。

责任编辑 战海霞

## A Mixed Combination of East Asia Model and Rhine Capitalism: Structural Features of Greek Macro- Economics and Their Shaping Mechanism

X N Hua<sup>1</sup>

(1. Centre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n Moderniz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ependency of Greek economic evolution on the path of market-orien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s been formed by Greek integration into US-led global system since early years of cold war; while its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made its economics deviated from export-oriented mode of East Asia. Meanwhile it manages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s fast growth although burdened by huge deficits and debts, with the support and aid from EU after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turns its deficits and debts into an inertia force. In general, its macro-econom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a mixed combination of East Asia mode and Rhine Capitalism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elements.

**Key Words** Greek Macro-Economy; East Asia Model; Rhine Capitalism; path dependency